

第三章

“皇帝”视察·市井初探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野心无止境地膨胀，黑龙江边境的日苏关系也日趋紧张，我所在的这支特殊部队为加强战斗力，不断地进行招兵买马，补充装备。我进入司令部当翻译时，正是它的“全盛时期”，新建才一年的大楼正门上挂着两米多长、金光闪闪的铜匾，上书“大满洲帝国江防舰队司令部”几个楷书大字。浩浩荡荡的灰色舰队定期巡航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上，耀武扬威。

组成第一舰队的四艘战舰的外观基本相似，各长约六十米，宽有二十米，系舰队中吨位最大、航速最快的主力舰。舰上各装备四门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长距离舰炮，十三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两挺。每舰官兵人数约二百人左右。最高长官舰长大都是“满洲人”。但一切军权，说了算的还是任副舰长的日本人。而士兵则清一色是身强力壮的“满洲”青年。其他舰只，能记得名字的有“大同”、“利民”、“晋江”、“晓江”、“定顺”、“永顺”等等大小舰艇三十余艘，都按战



陪同溥仪检阅舰队的伪满洲国的军政大臣

备需要，装有各式各样的枪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江上巡逻，对苏联示威或者提供边境情报。常常停泊在黑龙江上的一些口岸上与苏联隔岸对峙，互相虎视眈眈。苏联那边也不示弱，常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炮口对着我方。对岸浓密的柳树丛中时有苏军的炮艇神出鬼没地窜出来，响着骇人的汽笛声，故意越过江心国界线高速冲过来再绕回去，进行挑衅。相互眉目都清晰可见。有的大鼻子水兵吹着口哨，骂骂咧咧，大声怪叫。这些情况在国境水域司空见惯并没人大惊小怪。除黑龙江上的国境线停泊点外，在内河松花江上的佳木斯、富锦等地也设有军港。这里属于二线，建有庞大的油库、修船厂等后勤部门。舰队如有幸停泊在内河这两个地方，则可算称心如意了。因为这里不是前线，且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是松花江上最有名的两个货物集散码头。其繁荣

仅次于哈尔滨。尤其富锦，顾名思义，真乃“富庶锦绣之乡”。这里是东北最著名的大烟土（鸦片）产地，往来客商一多半是经营这个行当的老客。因此，这个边陲小镇倒也有着一段歌舞升平、繁荣兴旺的历史。

我的办公桌在司令部二楼副官处东侧临窗的一个位子。旁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满人”文书，一个十足的市侩油条。王副官安排我坐在他的上首位置，引起他极大的不满。从神态上，我就看出这家伙在心里正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这小犊子，仗着会几句哇啦哇，竟然坐到老子办公桌的上首，你他妈的够资格吗？其实王副官这么安排根本没一点偏心 and 私情。因为两个繁忙的电话，在处长不在时只能由我和他来接。对方说中文他还能对付，如果是日本人，他就抓了瞎。而我坐在这里，伸手即可拿起电话，交谈、办事非常方便。日子一久，他弄明白这个道理，才勉强咽下了这口气。

由于我年龄小，又在司令部里弄得上下一团和气，竟有年龄大些的日本人常常一见我就开玩笑地说：“宝伢（儿子）来了。”特别是一个胖得像大狗熊似的大镗头老上尉，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就嚷：“来啦，宝伢！老子正好有事找你呢……”这老头儿叫林传次郎，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没儿没女，只带着一个老伴来满洲。由于他对人十分和善，对日本人、“满洲人”一视同仁，无论对方官职大小，皆礼貌相待，所以，说句没骨气的话，他常叫我“宝伢”我却一点也不生气。不幸的是，这位和善的老人在一次国境线上执行巡航任务时，被苏联飞机袭击，机枪子弹由上向下直穿过他的特大号头盖骨，把他指挥的炮艇击穿了好几个窟窿。另外还有四名“满洲”水兵同时阵亡。

在举行吊唁亡灵的仪式上，我见到了他的遗孀。老太太

一身黑色丧服，手捧骨灰盒，蹒跚地走出司令部大门。不知为什么泪水竟模糊了我的双眼……你小子，这是什么立场、心理？日本鬼子是中国的仇敌啊，死一个少一个，应该感谢大鼻子才对！不过别忘了，我当时是什么身份。

我进入江防舰队司令部以来遇到的头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要光临本军检阅、视察！全军上下一阵大忙大乱。

迎接圣驾之事虽然接到的是“绝密”指令，但不几天就传得全军上下人人皆知了。造船厂接到命令要加快“御用艇”的大修、改造进度，忙得全厂工人屁滚尿流，灯光彻夜通明，将铁壳子船身敲得一片山响。第一舰队的四艘主力舰提前返航，油刷一新，届时，“皇帝陛下”将登舰视察。旗舰定边号改由顺天号代替，这大概是为了讨个吉利吧。迎接“圣驾”的仪式排练了好几回；我有幸位列最末，可以近睹“帝王风采”，不禁诚惶诚恐，激动得半夜没睡着觉。

1941年6月2日，凌晨，哈尔滨全城戒严。上午九时，本军最荣幸的时刻到了。司令部周围二百米已被警察、宪兵守住，老百姓只能在远处隔着警宪的背影向这里遥望。一列足有三十多辆高级轿车组成的车队直奔司令部大楼驶来。车队正中，是一辆由摩托车前呼后拥的大型轿车，里面坐着“皇帝陛下”溥仪。同车陪驾的是日军在“满洲国”的最高统帅、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别的车上则坐满了“新京”（长春）来的日、“满”各级高官、臣子。其中，在第二辆车上走下来一位胖墩墩的小老头儿，身穿燕尾服，两鬓霜白，身边的福岛告诉我，这位长官就是掌握整个“满洲国”行政大权的行政长官武部六藏。

油漆一新的栈桥两侧插满了日、“满”两国国旗和彩旗。军乐队由哈尔滨市第四军管区派的五十人组成，军装鲜明，全戴着白手套，演奏的乐曲是军乐：《我武威扬》。江面上，旗舰顺天号上响起礼炮声。接着定边号、亲仁号、养民号等舰依次鸣放礼炮，炮声不绝。水上警察队的小汽艇在离舰队五十余米周围穿梭般巡逻警戒着。

“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终于走下了汽车。我眼前的“皇帝”白净、文弱，近于干瘦。身穿一套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天蓝色海军大礼服，金穗垂肩，满胸是勋章、绶带，金光闪闪。头上戴着两头出尖“大列巴”似的海军将帅礼帽，缓步踏上了通往栈桥的地毯。司令官尹大胡子侧身在前引路。梅津大将和武部长官则紧随在溥仪身后半步的距离。

排在队尾的我，正位于通往江边的栈桥末端，右边就是靠在码头上装饰一新的汽艇。

尹司令先一步下艇，转身伸手来搀扶皇上。许是司令身体太重又非常紧张，致使汽艇产生了二三度的左右摇晃。刚踏上船帮一只脚的溥仪身体立刻向一边歪去。近在咫尺的福岛却愣在那里，手足无措，没敢动弹。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大概是“马屁经”的训练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自然而然地抢上前去，左手托住皇上手臂，右手抓住张开的右手，稳住了皇上的身体。溥仪侧脸满意地看了我一眼。这时，吓白了脸的尹司令也拉住了溥仪左手，小心翼翼地将皇上搀下了汽艇。接着登船的是梅津大将和武部长官。这两人大概都是行伍出身，动作比皇上稳健、敏捷，根本没用人搀扶。

随后还有不知姓名的日、“满”文武官员十余人上艇。军乐队一直在不停地演奏，舰上礼炮间隔鸣放。御乘汽艇开始缓缓移动了，后边跟着三艘小些的汽艇，也坐满了够级的

大人物。

今天御乘汽艇的驾驶员换了日本人：海军轮机上尉三浦太郎。汽艇以时速三海里的速度缓缓前进，江面波平如镜。当驶到离顺天号约三十米的距离时，舰上列队的官兵齐声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日满亲善万岁！”呼声震天，礼炮声震耳欲聋。尾随在后的三只小艇也同享了“陛下”的荣光。各舰官兵频频敬礼，一阵阵口令、欢呼声。溥仪大概怕风，没站在汽艇前头而是坐在舱里，紧靠窗户，稍稍探出头来举手向舰上官兵致意。不知什么原因，原计划的登舰视察项目被取消了。御乘汽艇只是在江面上沿着舰队队形，在每一艘军舰前边也没停留地缓缓驶过，引起一阵阵欢呼和礼炮声，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检阅江防舰队之后对舰队日、满高官下赐“教语”



从头到尾还不到一小时就算完成了检阅仪式。

汽艇绕了一个小弯，慢慢地驶回南岸，靠在了栈桥上。福岛带着我们跑上去系缆绳、定艇位，好几个人用手拉住船舷让它一点也不摇晃。尹司令先跳上岸，回身搀扶皇帝顺利登岸。然后便是梅津和武部……其他小艇上的官员也鱼贯而上。军乐队早已又演奏起来。停在地毯另一端的汽车队则一律大开着车门，迎候着“皇帝陛下”和他的随员们。

溥仪边走边向地毯两侧的官员们举手敬礼。我忽然发现他不知何时竟戴上了一副无边的眼镜，大概是怕江风吹着吧。

车队因为排得太长，尾巴已经甩到东边港务局后头了。“陛下”的专车已不见了影子，队尾的汽车还没挪位。听说“皇上”只在本市最高级的“大和宾馆”稍事休息，午后两点就要乘专列起驾回“新京”了。

送走吾皇，全军上下都长出了一口气。日本顾问授意尹司令可以放假一天，以示慰劳。不知什么原因却在三天以后才执行。

上班后，司令部上下好像还没歇过乏来。个个吊儿郎当，哈欠连天。闲聊的话题仍没离开“御驾光临”这件事。福岛用卫生球眼珠瞅着我，道：“左君，你的胆子和福分真不小啊，竟然摸着了皇上的手呢！”我吓了一跳，马上笔直地站了起来，红着脸说：“那天，真是太失礼了！”福岛的脸上满是嫉妒和嘲讽。一边的津高参谋毫不介意地摆摆手，示意我坐下，和福岛谈起了别的事，把话题岔开了。

原来他们正在议论本军将由“江防舰队”改称为“江上军”，划归陆军统辖一事。什么陆军少将参谋长林保治（日本人）将要首先到任，江北的作业队兵营即将竣工、等待新

“国兵”入伍等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浮上心头，使我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的前任翻译刘先生被调到了江北的“海兵训练处”。这个训练处属于本军的一个教育机构，类似低等军校。新入伍的士兵必先在这个兵营里培训一段时间才准许上舰。其教官、职员大多数人都家住江南面的市区内，上下班要用运输艇接送。这种运输艇是木制的大舢板，能装三十多人，方头方脑又粗又笨，装着柴油发动机。大家给它起了个怪名：棺材头。这种运输艇不论气候如何，每天都得横渡八百多米的江面。这位刘先生十分忌讳运输艇不吉利的绰号，也不愿每天渡江涉此风险，到任几天便辞职，去上海什么衙门高就去了。后来是一个姓马的接替了他的职务。据说他没经过考试，是日本人佐佐木中校推荐的。常听江北的水兵们说，这小子很横，杀打不惧，逛妓院、砸酒馆，打着司令部翻译的招牌已在市面上闯出了名气。但这家伙是个“独行侠”，没什么哥们儿照应，所以也常常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连对方是哪路英雄都不知道。有一次我曾看见他头缠绷带从医务所出来，气急败坏的日本医官站在台阶上指着他后脑勺大骂：“八卡牙路！”

在这些人的反衬之下，从不惹是生非的我，渐渐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大约在1941年末，我的官运开始亨通了。伪国务院军政司下令，各军可以选拔优秀的文职工作人员委以军队官职。一天，人事处日本军官斋藤中尉悄悄对我说：“你小子，好福气呀！这次中央任官有你一个。这回非请我喝一盅不可！”

果然，三个月后，委任我为“翻译官”的命令就下来

了，而且是一等文官。按惯例，文官也和武官一样要由三等、二等逐渐上升到一等，这次对我是破例了。此后，副官处每月发给我职务津贴十五元，加上月薪我的收入和地位已和中尉相似，并具备了考高等官的资格。

与此同时，赞誉、羡慕和嫉妒、嘲讽也潮涌而来。军法处那个日本人文书小野仁藏尤其可恶。在走廊里和我相遇时，他竟恶狠狠地从牙缝里冲我道：“别高兴得忘了自己是什么东西！”意思是：你小子是“满洲人”，下等民族！气得我脸色铁青，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操你妈，小鬼子，有一天我叫你认识满洲爹！默默地咽下了这口气，心里给他记上一笔账。

服装发下来，是一套半西装式的文官军装。配以白衬衫和黑色、国防绿两种领带。肩上一道金线，三颗星花；脚上是长腰皮靴，腰上是一柄长约一尺六寸的短剑，头上是大沿军官帽。这一身披挂配上我一米八的个头儿，走起路来好不威风，不怪小野仁藏那个瘪猴儿眼红。

出门办事，虽然还是三轮摩托，但有重要文件递送时连汽车也可以随叫随到了（汽车队十几台卡车、轿车、吉普车都由副官处掌握）。

一个星期六的下班以后，我私下约好人事处的斋滕和他同室办公的少校菅原老头，另外邀请了对我亲如兄长的王副官。

在离司令部仅有十分钟路程的中档酒楼“厚德福”，我们四人搞了个小小的聚餐，只花了我十二三块钱。按当时的水准既不算奢侈也不寒酸，大伙儿都很满意。席间，年轻的斋滕不免对我吹捧了几句，酒言醉语中竟然告诉我：“左君，说老实话，我们从来没把你当外人看待，你这次的幸运，是

大家共同的默契。尤其你小子还有几分像你们的皇上呢……啊，哈哈。”

我暗暗吃了一惊，不知他指的是长相，还是我的“奴才相”，真他妈令人莫名其妙。

有了官职、官服，薪水又增加了不少，家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老爸已经能经常喝上他喜爱的杯中之物了。我家虽然还住在大杂院里，但地痞、流氓的骚扰基本绝迹，邻居们都知道这是沾了我的光。老爸经常告诫我别得意忘形，千万不能做丧良心的事，对日本人要尊重、服从，对中国人要和气。无论是谁，能帮一把时一定要伸手。如果仗势欺人，只要叫他知道，小心“耳雷子”，“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官”。

当时，日本人在关内的战线不断扩大，军备消耗惊人。富饶的东北大地已被刮地三尺，仍满足不了战争的需求。市面上的物资供应，日见紧张，除生活日用品外，汽油、柴油、粮食等战略物资尤其紧俏、奇缺。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国”的军政各界，大小官吏无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鸦片到汽油，从粮食、食盐到粉条、鱼干都在他们手中弄来倒去，低进高出，从中渔利。个个捞得腰包滚圆、脑满肠肥。时间一长，我也看出了点门道：原来司令部里许多军官，包括日本人也都有外快可捞。心里不禁也有些发痒，想琢磨点生财之道。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入哈尔滨市一些军事机构和军需部门，当时各军事部门都有一种叫做“酒保”的小货栈，向军职人员供应生活日用品（类似现在的“军人服务社”）。这种酒保的货比一般市面上的百货店价格要低两成左右，且品种齐全。常有朋友托我替他们买点香烟、布头什么事

儿。后来我发现，别的东西不算啥，惟烟、酒和白糖的价格，这里要比市面上低许多，有的品种甚至低百分之三十左右。于是，我和常给我开摩托车的—一个叫佟玉的上等兵合伙，做起了这项买卖。由我出面，经常以司令部开会、宴客的名义成箱地买出香烟和瓶酒，装进摩托车挎斗拉出去，再让他找些小商贩销出去。货又俏，价又低，脱手毫不费力。获利二人平分，每次都能弄个十块二十块的，让手头宽绰好几天。

后来，我又“开发”了一个进钱的项目，着实得了不少甜头。

有一次，我家的一个邻居找到我，说他舅舅是一个建筑队的工头，前几天去江沿拉沙子、筛石头，被巡逻艇上的水兵打伤了，还差点被抓起来。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市区这一

印。并通知江上巡逻队，凡持此牌者，准许在指定地点筛石取沙。很快，我手中的“腰牌”就发出了十几个。江岸上再也看不见鸣枪示警，推搡吵骂的情景了，兵民皆大欢喜。来请牌挖沙的老板们对我感激不尽，攥着钞票的手没少往我兜里塞。后来，一些司令部的同事也有人来向我替自己的亲友要这种“腰牌”。我乐得送个人情，往往来者不拒，一概满足他们的要求。渐渐地还交了不少朋友，周围的笑脸明显增多。为了掌握住“腰牌”的发放权，我常常从这笔外快中拿出一部分来请几个直接管我的上司和有可能过问此事的日本人下馆子、看戏。就这样，我不仅在司令部里慢慢红了起来，就是走到街上，由于腰包充实，腰杆儿也似乎拔高了几节。

初夏，在北国的哈尔滨正是不冷不热的季节。黄昏时，市面上一派繁华景象。当时正是二十二三岁，风华正茂的我，耐不了大杂院斗室的寂寞，常常走上街头去闲逛。按说，我的年龄也该结婚了。何况周围还有许许多年貌相当的姑娘们常向我暗送秋波，但我仍没有动心。记得国高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本来那个日本老校长已经讲完了话正往台下走，突然又返回讲台，补充了这样一段话：“诸君，请原谅，我想起了一件事，非说不可。今天你们毕业了，是一个人生阶段。恐怕有的同学将就业。上班后，有了收入，第二个问题就是结婚。但请你们注意，此事千万要慎重！日本的男子汉不到三十岁是不考虑娶老婆问题的。如果你们到了非娶老婆不可的时候，一定要挑一个比较丑一点的姑娘为好。我奉劝诸君，漂亮的女人是没一个有好良心的啊！对，就是这样……”弄得台下哄堂大笑，也有不少人鼓了掌。大概此话

对我影响较深，所以我很少和姑娘们亲近。

信步走出无聊的家门，第一个目标就是张学智家。这是个供职于市政府的小职员，长相漂亮，生活浪漫，能拉胡琴，会唱京戏，好热闹。在他家扯了顿闲白，又南腔北调地叫唤了一阵子京剧片段，便百无聊赖地一同走上了街头，去消磨时光。

隔条街不远，就是茶肆酒楼林立的“杂八地”。当时哈尔滨的所有酒店饭馆之类的场所都是半商半妓式的营业方式，虽以卖酒菜为主，但也雇来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地招揽酒徒、色鬼，真正品味道、饱口福的客人很少往这种地方来。而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登徒子”们则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里开业的酒店老板背后都得有宪兵、鬼子或黑社会的头子们当后台，否则是无法营业赚钱的。而我们走进的一家酒馆，正是这种地方。

这一带我虽然不常光顾，但也满不在乎。那些早出外进丑态百出的酒鬼、警察、宪兵和特务能奈我何？在咱们海军眼中，警察叫“狗子”，宪兵是天生的死对头；凭着我这一身制服，锃亮的高统马靴，谁见了不得惧三分？在酒气熏人，划拳声震耳的喧嚣中，势利眼的小伙计忙恭恭敬敬地把我们让进了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室内。

刚叫了两样菜一壶酒的时候，就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在说：“欣茹，你相好的来了，快去陪陪！”果然，不一会儿，门帘一掀一个叫欣茹的女人走了进来。提起这个可怜的女人，我还真得先交待几句。

她曾是我的一位朋友白老板的小老婆，都是山东人。白老板开了一家电影院，财运亨通后便讨了这个小老婆。后来被山东老家的小脚黄脸婆知道了。这位原配夫人特地赶来，

大打出手，动刀舞棍，搅得天翻地覆，非赶走这个二房不可。欣茹忍无可忍，只好和白老板一刀两断走出家门。这个举目无亲的孤女虽然得了白老板一点钱，但生活无着，不久就沦落到酒馆里成了女招待。以前我常去电影院看免费电影，路过白老板家也常进去坐坐。那时的电影院经理巴不得结交上我这样的人物，所以我一去，非常热情。他那二十七、八岁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对他的朋友也十分敬重，礼数周到，因此，互相很熟。当我一次偶然发现欣茹成了这里的女招待之后，便常光顾，有意使掌柜的不敢太欺负她。

这时的小酒馆里猜拳斗酒，男女嬉笑的声浪比街上的叫卖声还大，其中就好像有人沙哑着嗓子在喊叫欣茹的名字。正给我们斟酒的欣茹指指隔板，示意我们装聋作哑。我发现帘缝里有人在向里张望，下边露出一双缎面便鞋，胖乎乎的大脚，定是老板。他似乎是想叫欣茹又有些迟疑。紧接着就有人开始捶打壁板，并叫骂着：“臭娘儿们，快过来！”随之一个铅制酒壶便由隔壁水淋淋的抛了过来，正砸在我最爱吃的那盘炒肉拉皮上，碎瓷片、粉皮肉丝和调料溅了我满脸满身。我推开欣茹，正想站起身去隔壁给那些酒鬼一点教训，没承想，门帘突然被整个掀开，一前一后闯进两个大汉来。前一个头发蓬乱，西服敞着怀，领带已松扭到一边，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身材高大粗壮，足有三十多岁；后边的一个有五十岁上下，戴金丝边眼镜，满口金牙，黑紫色的锦缎大马褂也解开了全部纽襟。两个人晃晃悠悠似乎有点站不稳的样子。这时，长着两片肥脚丫子的掌柜抢到旁边，一脸横肉乱颤，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先生，对不住，我来介绍一下。大家都是场面上的朋友。”指着前头的汉子说：“这位是日本宪兵队的肖宪补（日本军籍，“满洲人”补助宪兵，通

称××宪补。在当时社会来说是天老大他老二的了不起人物)……”还没等这掌柜的说完这句话，我便感到左脸上突然狠狠地挨了一记大耳光，两眼直冒金星。我哪吃过这种亏，立刻还了手。小屋霎时成了战场，桌倒椅飞，杯盘狼藉。我那朋友不知何时已同欣茹一齐失踪。十几分钟的格斗，我觉得至少挨了七八个耳光，更不知什么东西击中了我前额，用手一摸疼痛异常，大包下已渗出血来。二比一的局势，我明显吃亏，最后已无还手之力了。心里恨极了临阵脱逃的张学智，真太不够朋友啦！两位英雄好汉正拍着胸脯指着鼻子大骂我眼睛的时候，这小酒馆里里外外已是人山人海了。不花钱看武打戏，永远是人们的嗜好。

这时，突然从外面分开人群冲进来七八个身穿海军服的大兵，边往里闯，边大喊大叫：“咱们的人在哪儿？在哪儿！”冲进了我挨打的小屋，看到我的狼狈相。我不知道这些救兵如何从天而降，但却明白战局已乾坤扭转了。立刻自报家门，并出示了司令部独特的身份证。其中一个丘八爷已叫了起来：“他是咱们司令部的左译官！”于是，不用再问别的，另几个精壮如牛的水兵已经很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两个刚才还大显神威的好汉，此时已龟缩到墙角，只剩筛糠的份了。转眼间，第二出武打戏变本加厉地开了场。只听得一阵阵暴响和哀嚎，夹着椅子的破碎声，不一会儿那挨揍的两个人已鼻青脸肿地走了形，堆在墙角、桌底下爬不起来了。

此刻，酒馆内外人声鼎沸，援兵还源源不断地拥来。原来是张学智去搬的救兵。当时这家伙一看大事不好，吱溜一下便从人缝里钻了出去。不怪其名“学智”，市井生活教会了他如何“学”乖，关键时刻如何用“智”。他知道，这时辰水兵最多、最常去的地方是戏园子，便没命地奔向了只隔

一条马路的戏园子“万福楼”。一脚踢开大门就扯嗓子喊了起来：“海军弟兄们快去呀，你们的人叫宪兵打惨啦——！”这一声，大概比他平日江边吊嗓子的水平要强好几倍。立刻，轰地一声，戏园子里就像炸了马蜂窝，正在看戏的足有七八十个水兵，一齐蹦了起来。这些弟兄们平时一听说打架，就和小孩过年去放鞭炮、味花一样，连后脑勺都乐开了花，何况对手又是宪兵！几十个水兵大步飞奔，不到五分钟就冲到了现场。由于酒馆太小，许多水兵冲不进来，急得在外边蹦着高哇哇大叫：“打死他！”“宰了他！——”吼声惊天动地。方圆几十米内的老百姓家的铁锹、木棍、门栓被抢拿一空。酒馆的门窗玻璃，连门框都被砸了个稀里哗啦，只差没拆房子了。

更有些平日受过宪兵欺压的老百姓在外边火上浇油，趁机泄愤，致使这场武打戏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是戏，就得有收场的时候。可我哪见过这等场面哪！心里忐忑不安，生怕闹出人命来。当认识我的那个水兵悄悄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着实有些为难了。有生以来头一次受此奇耻大辱，当着屋里街外几百号人的面前，我知道，“面子”这两字儿此刻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仗着水兵弟兄们给我撑腰出气的机会，冠冕堂皇地走出这个倒霉的小酒馆。

于是，我以胜利者的气派，冲周围几个吓得战战兢兢的小伙计吼道：“去！快把你们掌柜的给我找回来！”

在找掌柜的空档里，那个穿马褂的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金丝边眼镜早已不知去向，满口金牙被染红，捂着腮帮挤出笑脸，凑到我跟前，搭讪着说：“老弟我姓刘，叫刘贵，就住不远的桃花巷。今天的事全是我混蛋。大家误会了，不是说不打不成交吗？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友。改天我请

客，向老兄赔礼道歉，行不行？”那个姓肖的宪补则坐在墙角装死，一声不吭。

那个市侩流氓的掌柜终于被找回来了。一进门便跪坐在地上大哭大嚎，连连向我和几个丘八老爷打千作揖，满口江湖黑帮的“切口”什么三老四少，看在祖师爷的分上等等，我装模作样地吓唬了他一通，出了口恶气，便在一群水兵的簇拥下向门外走去。一路上抱拳过顶，向一群群来给我撑腰的水兵弟兄们作揖致谢，请他们散去。临出来时，瞥见那个大金牙刘贵正在身上掏出一大把钞票死气白赖地往一个领头的丘八爷手里塞，我便也从兜里掏出几张小额的钞票要给认识我的那个水兵弟兄。混乱中那个很够意思的水兵又把钱给我塞了回来，我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往外掏了……胖掌柜招呼来了洋车，好容易才算把我们这群瘟神送走，由他自己去收拾那一塌糊涂的战场了。

我坐上洋车，和弟兄们挥了挥手。车子跑出三五十米，灯影里发现张学智正在冲我招手。原来这家伙搬来救兵后，一直站在远处观战，直到最后落幕。